

第十一章

留守兵团的成长

走政治建军的道路

留守兵团是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部队，建立之初，就受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明确了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走政治建军道路的根本方向。今天回忆起来，感到还是有些经验可以总结的。

我一生做过军事工作，也做过政治工作，也有过军政工作一肩挑的时候。从个人的爱好上说，我酷爱军事工作，我带的部队，总是希望她充满生龙活虎的朝气。还是在我担任军委参谋长的时候，部队刚进延安，由于长期艰苦的生活，指战员们的体质较差，部队文化生活也很单调。我在部队大力提倡开展军事体育活动，土法上马，自建场地。带领部队跑步、做操、越障、射击、投弹、跳高、跳远、打球。每天除了正常训练以外，晚饭后部队都到提场上去活动，记得在一个满天星斗的晚上，毛泽东同志来到我的

住室。我向毛主席报告了最近一段的工作和今后的工作打算。毛主席听了以后，亲切地对我说，搞体育活动很好，很必要，使部队有生气，有战斗力。但在这同时，还要重点抓一抓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党的建设，深入到下边支部去，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于是我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得知以后很满意。这件事给我教育很深，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时时提醒自己，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紧紧抓住政治思想教育这一环。

为了使留守兵团的干部战士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我们从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起，就在部队建立了政治教育制度，规定政治教育内容，适时地进行时事政治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结合部队的思想实际，纠正错误思想，明确政治方向。我们针对干部战士的不同程度分别进行教育，特别抓了干部教育。当时，留守兵团的营以上干部普遍组织了政治学习小组，以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联共（布）党史，以及党中央文件、毛泽东同志的时事政策讲话为主。兵团经常组织干部轮训、短训，使兵团各级领导干部思想统一、方向明确，时下级实施教育能具有一定的水平。在连以下干部战士中，每星期上四次政治课，以兵团政治部编的《政治深本》为教材，学习浅显的马列主义基本常识和党的基本知识。同时也结合形势任务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讲话，党中央的有关指示。

在留守兵团建立初期，部队教育的重点是统一战线的

问题。开始,是进行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的教育。记得在改编之初,我们接受了国民党的统一编制,领取了国民党发的军服。当摘下红五星军徽换上青天白日帽徽时,不少干部战士思想不通,人民群众中议论也很大,个别战士甚至为此开了小差。对不少人来说,统一战线是个新名词,对它的性质、意义认识不清。转这个弯子的确花了不少气力。兵团政治部专门编了《统一战线教程》的课本进行教育。对干部们,几乎天天讲统一战线,从国内的民族矛盾讲到国民党营垒中的矛盾,从东北军,西北军的转变讲到西安事变,从蒋介石顽固反共讲到不得不接受我党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宣传统一战线建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识我党我军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才转过这个思想弯子。从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我们针对党内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结合六中全会的传达,在部队主要进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思想的教育,既反对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又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这一教育,为以后的反磨擦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时思想教育最经常的一项是增强团结的教育,从留守兵团内部关系来说,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问题,上级和下级之间、干部和战士之间的团结问题。这是我们经常讲、反复讲的问题。因为部队来自各个方面,有长征过来的,有陕北本地的,后来还有不少内地来的知

识分子。我们提出，外来干部要向本地干部学习，本地干部也要向外来干部学习；新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要向部队原有的干部学习实际工作经验和作战经验，工农干部要向知识分子干部学习文化，学习理论。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留守兵团还吸收了一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军官。对他们，我们用其所长，在使用中团结、教育他们。一九三八年，延安发生了张国焘逃离边区、投降蒋介石的事件，留守兵团运用这个反面教材，进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的教育，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党的纪律教育干部、党员，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部队的团结统一。坚持团结，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任人唯亲”的不公道不正派的作风，坚持“任人唯贤”的公道正派的作风。留守兵团第一次党代会上，我们制定了以“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衡量干部的方针。对干部，坚持放手使用又给予适时的指导；给予学习机会以提高工作能力；检查工作以帮助总结经验；批评错误；耐心说服教育以帮助改正，同时关心照顾他们的困难。特别是对子犯错误的干部，我们总是坚持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因而，留守兵团上下级的关系始终是融洽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团结的基础。

毛主席十分重视团结问题，他和我谈过很多次话，谈的最多的是团结问题。

有一次，我和毛主席一起过延河去杨家岭，走到女子大学下的河坝时，我向他说了这样一件事。女大有一个女同志在石坎下洗衣服，我们有个战士把一块石头踢了下去，打了她的头，双方争执起来。这个女同志说战士是有意打的，战士说是无意打的，这件事到现在还没解决好。毛主席听了以后说，不管怎样，我们的战士要做自我批评，毕竟是打了人家的头了嘛。他说，遇到问题首先要批评自己，然后再去批评别人，别人也才能做自我批评，这要成为一个原则。凡处理内部的团结问题，都要这样做。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做工作，圆满地处理了这个问题。

在内部团结中，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军政、军民团结问题，给予了很多的指示。我们也做为对部队进行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记得刚到陕北的时候，我们南方籍的战士对陕北的风俗民情不太了解，有些事情影响了军民团结。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的战士向当地群众借门板，必须说清楚是“借门板”，而不能说“借板子”，后一种说法陕北群众认为是一种侮辱性的说法。凡做错了事，我们首先教育自己的部队向群众赔礼道歉，说明情况，做自我批评。同时为了搞好军民团结，我们在春播、夏收、秋收等农忙时节，带领部队积极进行助民劳动。还协助地方卫生部门为地方群众防病治病。逢年过节，检查群众纪律，

组织联欢会，请群众看戏，密切军民团结。

为了配合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留守兵团政治部出版了自己的小报《烽火报》，建立了自己的《烽火》剧团。各连队都有自己的墙报壁报，连队的俱乐部工作也很活跃。战士们自制乐器、自编小剧本、演戏、唱歌。还自制体育器材，开展各种体育活动，战士们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各种活动，调节了情绪、陶冶了情操。留守兵团每年“八一”都开运动会，检阅部队军事体育的成绩。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当地的群众都来观看，非常热闹。逢年过节，部队都有文娱晚会。后来，还开办了部队艺术学校，培养专门的文化艺术人才。至今回忆起来，部队那种生动活泼的气势还历历在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前方的需要，留守兵团部队的一些干部、战士调到前线去了。前方的形势发展很快，引起留守兵团的一部分干部不安心后方工作，急于上前线，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思想问题。不少干部找到我，有的是直接要求走，有的是流露了这种思想。针对这些思想，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教育大家服从革命需要，克服个人主义。同时号召大家充分利用根据地的和平环境，加紧学习政治、军事、文化，掌握更多的本领，以适应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

在留守陕甘宁的八年中，正是依靠这些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才使留守兵团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坚强的

团结，忘我的精神和正确的方向，取得了剿匪、河防、反磨擦、大生产等各项工作成绩。

向部队正规化迈进

在留守兵团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制订了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目标。所谓军队正规化，首先要做到统一思想、统一编制、统一制度、统一指挥、统一纪律。在颁布了留守兵团的统一编制以后，我们认为，要把整顿组织纪律，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提到日程上来。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以后，我们即组织力量，做调查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统一的规章制度。到一九三八年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时，颁布了“建立正规军队制度的各种草案”，其中有“报告制度草则”，“建立汇报制度大纲”，“司令部工作报告大纲”，“平时起居时间规定”，“值班制度规定”，“关于干部提升及调动的规定”，等等。一九三九年五月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在上述草案试行的基础上，进一步颁布了《内务条令》（十章一百七十六条）、《纪律条令》（五章）以及《参谋工作条例》等。这些条令、条例和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的面貌大为改观，滥用权力、任性处罚的现象没有了，违反纪律的行为成了众矢之的。从指挥员到战斗员，人人都以破坏纪律为耻，把遵守纪律，执行条例、条令做为每个革命军人的职责，并引以为荣。这件工作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部队良好作风习惯的养成靠我们一点一滴的工作。就拿执行《内务条令》来说，就很不容易。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部队战士大多数来自农村贫苦的家庭，部队的生活条件一直也比较艰苦，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提出要改变落后的、不卫生的习惯，养成讲卫生、爱清洁的习惯，降低部队的发病率，就需要做相当的工作。那时，我们干部除了以身作则外，还长一张婆婆嘴，给战士上卫生课，普及卫生知识，经常讲、反复宣传，如：不讲卫生是文化落后，不文明的表现，正规化军队必须建立整齐、清洁、文化的兵营生活，有些事情还得手把手的教。比如挖厕所，南方籍的战士到北方来，挖厕所就是个新事物，在什么地方挖，怎样挖都得教。总之，这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实行，为保证部队各项任务的完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使这支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的部队，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严格的组织纪律，统一的编制制度，向部队的正规化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留守兵团的军事训练是别具特色的。在当时，留守兵团既担负着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任务，又不象前方部队的战斗那么频繁，那样四处流动，因而既有训练的必要性。也具备了一定的进行训练的条件。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军事是一门科学，有它自身的一般规律性。按照正规化的要求进行军事训练，就要注重一般的基础训练，有相对的系统性；同时，还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当前战争的针对性。我们的训练方针应当在这两方团的结合上下功夫。当我把这

些想法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给予了肯定的支持。这样，我们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制订了“打稳部队技术、战术的基础，发扬现有武器的威力，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学习现代新式兵器的战斗法；建立部队中正规制度，加强干部的管理、训练与组织指挥能力”的军事训练总方针。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主要是近距离射程的步枪；我们的部队则是经过长期政治教育，有共产党员作骨干，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部队。因此，我们的训练就要在发扬现有武器威力的基础上，提高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突出我军的传统战法，发扬勇猛、果政、机断的白刃格斗精神。那时部队还担负着剿匪、河防以及生产等任务，就利用作战、行军、筑垒以及战斗、生产的间隙，按照当时当地的情况，根据教育计划，从制式教练、班排动作、射击、投弹等基本战术技术开始，循序渐进地对部队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训练为战斗作准备，战斗又检验了训练的成效。经过半年多的战斗、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我们开展的创造特等射手的活动，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以步枪卧姿射击为例，一九三七年一百米环靶，命中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七。而一九三八年二百米灰靶（80×40公分）命中率为百分之八十七；特等射手二百五十米命中率为百分之九十四。每班至少有三个特等射手。从这时开始，留守兵团创造了把技术和战术分开训练的方法。从战术方面，注意统一战术思想与战斗动作。

各部队根据自己担负的任务进行训练，如河防部队演习河川攻防战，三边部队演习对骑兵的攻防战，游击战术、夜间战术的训练都逐步提到日程上来了。当时的重点是连以下的战术指挥与战术动作，主要演习科目是进攻中的指挥地形利用、队形选择等等。还研究学习对新兵器的防卫战术。一九三八年七月，在留守兵团的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上，检阅了部队的训练成果，充分肯定了部队的成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巩固提高现有的训练成果外，从战争的发展着眼，提出加强对各种特种兵器，象炮，轻、重机枪、自动步枪以及炮兵、通信、侦察、特工等特种兵的训练。战术上也加强了对敌特种兵的攻防训练。同时，分别对干部战士提出具体要求：要求一般战士在任何情况下，能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动作，老的战士能做班长的动作；现任班长能做排长的动作；现任排长能做连长的动作。干部教育以提高战术技术素养，提高教育、管理和指挥作战能力为主要目的。连排干部以提高对连排战斗的指挥能力，对新兵器、特种战术的教育能力，对部队管理教育的能力为主，学习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营团以上干部以学习研究游击战术、兵团战术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提高组织指挥能力为主。这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军事著作发表，我们即作为干部必读的教材。在这两篇著作的指引下，部队的各种教育训练内容更加充实、深入和面向实际。

毛主席对部队的军事训练非常关心。我每次去向他汇报部队的训练情况，他都非常认真的听取，并适时地给予了很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他要求我们，要虚心学习前方的作战经验，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他要求我们团以上干部要注重研究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对部队的训练，毛主席要求我们少讲多做，采取启发式，多搞实兵演习。那时搞训练不象理在，既缺教材又缺器材，也没有现成的军事教官，主要靠抓干部教育，靠示范教学。留守兵团每半年开一次兵团首长会议，每一次会议又是实际的干部集训。一方面汇报交流过去的训练情况，一方面讨论制定下一步教育计划，然后进行统一标准的训练。会议期间，团的干部全扎上皮带当列兵，旅的干部当班、排长，然后再回去训练下级干部。在部队，以团为单位，建立由团长、政委、副团长、参谋长及各营营长组成的教育委员会，集体领导本单位的教育训练工作。各营又有营一级干部和各连连长组成的教育小组，负责训练排以上干部。然后再去带动战士训练。形成了一个教育训练网。那时候，教材也很缺，正规教材只有国民党发的《步兵操典》、《野外勤务》、《作战指导纲要》、《步兵教范》等书，从数量到内容上部不能适应部队训练的需要。我们就自己动手编教材。象“夜间训练”“防毒防空”“轻重机枪使用”“参谋工作提纲”等等，都是自己编的教材，那时找一点军事参考书十分困难，我虽然在苏联

专门学过军事，但回国时为了对付层层检查，基本上什么书都没带回来，以后在中央苏区收集了一点，长征轻装时，只留下两本，一本是《战役问题》，一本是《战斗条令》一直带在身边，在留守兵团的初建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我们还注意学习前方的经验，将《晋察冀抗日经验》《冀中平原游击战经验》等等，印发给部队做学习教材。后来条件好了些，我党从共产国际带回一些俄文书籍，延安翻译局的曾涌泉等同志翻译了一批苏联的军事教材。在各种教导队训练班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留守兵团办的第一个训练班是参谋业务训练班，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陆续办了机枪训练班、特等射手训练班，学习组长训练班，防化训练班，侦察训练班等等。我们开始办参谋训练班时是最“穷”的时候，留守兵团刚建立，一无所有，除了原有的参谋外，又从部队选了些文化水平较高有一定作战经验的同志参加，目的是提高机关工作水平，有效地指导部队。邵震同志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他到参谋训练班时什么都没有，经常和我在一起，我凭记忆口授参谋工作的业务课，他们记录整理，再印出来当教材。学习制图、标图时也是自己画的草图，一切都是土法上马，培养出留守兵团第一批参谋人员。陈慕华同志也在参谋训练班学习过，是留守兵团的第一个女参谋。

说到参谋训练班，使我想起了我的侄儿肖伟（又名肖伯鳌）。一九三八年初，在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的高潮中，知识分子一批一批的来到延安。肖伟时值高中毕业，也积极加入了这个潮流，只身来到延安找到了我，要求参加革命。那时他年轻英俊，充满革命热情，他在参谋训练班学习，成绩很好，以后在延安炮兵司令部做参谋工作，一直积极肯干。一九四四年八月，党中央决定派三五九旅挺进湖南、粤北，开辟以五岭山脉为中心的华南抗日根据地，以阻止国民党的反革命逆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肖伟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我，坚决要求随三五九旅一起开赴前线。精诚所至，我找准了他的要求。十一月，肖伟随王震、王首道同志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挺进鄂豫皖。后留在长沙。一九四八年，他在周里同志领导的潮南省工委做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被长沙市国民党警察局长蒋×捕去，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活埋，壮烈牺牲。一九四九年长沙和平解放后我听到这个消息，便找到他的遗骨，重新安葬在岳麓山爱晚亭东南方百多公尺的地方。在他的墓前我沉默良久，回忆他的音容笑貌，感到十分痛惜，肖伟是我的好侄儿，也是革命的优秀战士，他没有辜负党的培养教育。他为革命而死，死的壮烈、死得其所，我至今仍深深的怀念他。

一九四〇年，为了进一步提高留守兵团的干部素质，我和几位领导同志研究决定，开办了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轮训营以上干部。第一期的班主任是张文舟，罗钰如任教务处长。研究班开设军事课和政治课，聘请我党的一些理

论家讲课，如艾思奇讲哲学课，马洪讲政治经济学，郭化若讲军事课，毛泽东同志也来讲过课，我和曹里怀也兼讲军事课，如兵团战术等。每期半年，大约办了三、四期，对留守兵团干部的军事理论、政治理论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留守兵团的干部战士中，我们还普遍倡导了文化学习。开始，部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能看书、读报者报为普遍，营连干部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五十，指导员不能讲政治课的也为数不少。兵团政治部提出学习文化的具体要求：干部识字要在两千以上，能读报、看文件，写简单的书面报告；战士识字在五百字以上，能写简单的信，能写墙报稿。经过几年的学习，实际上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当时干部、战士学文化的热情特别高。窑洞内外的墙上都挂着识字牌，还学习“新字母”。纸笔缺乏，就用树枝、木条代替笔在地上写，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纸。耿飏告诉我，他的文化水平本来不高，在驻守陇东期间，留了个到延安来的大学生在身边工作，每天教他学习文化。几年下来，自学了高中的数理化，读了不少书，很有提高。

在对部队的教育方式方法上，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四个基本原则：一是不贪多，少而精。不论课堂、野外、操场，各种科目都抓住重点进行教学。二是多做少讲。一切战术动作，都尽量避免在课堂内纸上谈兵，多在

野外实际地形下，出具体情况，且做且讲。三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反对抽象空洞的讲解，多打恰当的比喻，用图表、沙盘做形象教学，反对教者故弄玄虚，故作深奥，把原则讲成僵死的教条。四是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在课外，利用俱乐部活动，组织演讲会，问答晚会，猜谜、揭晓、读报等活动，将教育训练的内容生动活泼地贯穿进去。那时的教育训练也注意与学习、生产结合起来。有的部队在行军中，不但能利用大小休息进行教育，而且在行军中，干部插入队里，提出简单明瞭的问题，战士边走边想，边做答案，干部且走且听，且做扼要总结。有的部队在河防土工作业中，一边做工事，一边读报学习。有的部队在生产打柴中，干部随手指一目标互相测量距离，识别地形。有时假设一简单情况，演习运动跃进。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训练方法，使指战员们的实际的战术技术水平提高很快。

随着军事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的深入发展，干部中形成了研究学习军事理论、深索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热潮。由此也提出军事训练如何更加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的问题。于是，从一九四〇年开始，留守兵团决定开展以近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

近战教育算是我的一个主张吧，也是我对毛主席军事理论学习的一个运用。为什么要进行近战教育，我的主导思想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出发的。由于我们的部

队主要是装备较劣的步兵，而作战的对象则是装备精良的强敌。积当时抗日战争两年多的经验，以我们装备技术落后的军队与装备技术现代化的敌人进行战斗，必须采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以我之长攻敌之短。近战的特性，就是步兵以神速荫蔽的动作，乘敌不备或立足未稳，突然接近敌人，用猛烈的火力袭击敌人，进行连续的冲锋，肉搏，以及进行短距离的包围迂回的机动和反复地击退敌人的反冲锋，连续突破敌人纵深，以追击或火力追击，迅速歼灭敌人。从正规战的操典未说，战斗的一般进程是：运动接敌、展开、冲锋、纵深战斗、追击几个阶段。近战就是强调从冲锋开始到纵深战斗这一阶段。这是战斗中最紧张、最复杂和最顽强的战斗阶段。对于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未说，是最能发挥我军特长的阶段。依据上述观点，我写了一篇《近战战术》的教材性的文章，发到部队指导整个部队开展近战教育。这篇文章毛主席亲自阅过，并指示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了小册子。

近战教育很快在部队展开。在前一段教育的基础上，训练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了。在技术方面，强调发扬步兵近战的威力，着重训练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四大技术；在战术方面，着重演练射击与运动的联系，突破前沿，连续的纵深战斗——击退敌人的反冲锋、追击和战斗动作上的迂回包围。研究近战战术，就是研究如何

尽快地接近敌人，熟练运用四大技术，坚决、果敢、勇猛、迅速地消灭敌人，从而发挥我军现有武器的威力。在实践中，战术和技术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技术是战术实施的基础，而战术则是使技术得到充分有效发挥的保证。鉴于近战是与敌人短兵相接、战斗最激烈的阶段，我们在训练中特别注重培养指战员机动灵活、坚忍不拔、勇猛果敢的战斗作风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培养指战员人人成为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牺牲精神的精兵强将。

在近战教育中，留守兵团经常进行实兵演习。毛主席得知留守兵团要搞演习，经常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亲临演习场地。他走到我们司令部工作人员中间，详细询问战术演习想定，走到战士们身边，仔细观看他们的战斗动作，对我们的演习给以指导。毛主席十分高兴，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记得我曾经让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搜集了一百多个战例，包括反磨擦斗争中的典型战例，结合近战教育，在干部中进行战例讨论，研究不同情况下的作战经验，进一步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这一教育训练的开展，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这前后，胡宗南等顽固派纠集国民党五十万大军包围封锁边区，不断挑起磨擦战斗，政治土匪也不断进行骚扰活动，部遭到了我军迎头痛击。

一九四二年底，留守兵团与贺龙同志的晋绥军区的部队合并成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

任政治委员，徐向前和我任副司令员，我主要分管训练工作。留守兵团的各个部队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一九四三年冬，边区面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紧张形势，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了战备动员，要求边区部队很好地进行冬季训练，准备迎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挑战，方法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九四四年冬季，全国面临大反攻的前夜，部队又规定了“巩固提高技术，着重战术，加强业务教育，进行全面训练”的方针，用百分之六十的时间进行了战术教育。两年的冬季训练，部队在战术上提高了勇猛、机动、顽强、速决的近战、夜战的特性。四大军事技术也更为熟练。八年抗战，留守兵团成长为一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红色劲旅，为前线输进了二千多名经过比较系统的军事训练的干部战士，也打下了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基础，并且为解放战争准备了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

为了不被困死、饿死

留守兵团组建以后，干部战士的生活一直非常艰苦。根据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时达成的协议，国民党只拨给很少的一点薪饷，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菜金，有时连饭也吃不饱。大家的穿着都很破烂。到了夏天，有的还穿着棉衣；

天气已经很冷了，有的还穿着单裤，甚至短裤。战士每个月的津贴费，只有一元钱，连一双布鞋都买不到。部队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而担负的剿匪、河防等任务却又非常频繁。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留守兵团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就把生产作为三大任务之一，在留守兵团各部队都局部地开展了生产运动。

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国民党为了适应他们制造磨擦、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需要，采取种种方式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一度给边区的经济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他们的第一手，是在给八路军的薪饷问题上用克扣、拖欠来做文章，在军粮供应等问题上也制造困难。例如，359旅驻防绥德地区以后，粮食非常困难，国民党西安行营却指定该旅按月到洛川一所粮库去领军粮。绥德到洛川，相距千里，我军既无运输车辆，又无运输经费，这显然是有意出难题。到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国民党便完全撕毁西党达成的协议，全部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他们以为，凭这一着就可以把八路军、新四军逼上绝路。他们的第二手，是采用掠夺土地、牲口和其他财物的办法，破坏春耕秋收，破坏边区经济建设。这类事件，各地都有，而且经常发生。一九四〇年六、七月间，仅关中一地，顽军窜进边区就抢走耕牛十八头，烧毁小麦十七堆，抢走和糟塌粮食一百五十石，勒索银洋数百元。郿县牛武区的西个村仅五十三户

居民，在不到半年时间，就被附近的顽军抢走粮食九千多斤，蔬菜一万多斤，以及一大批农具、食盐、黄麻和其他日用品。他们的第三手，也是他们感到最得意的一手，便是利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历时八个多月构筑起来的碉堡封锁线，对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周围的顽军在各村镇到处设立了检查处和侦察网，并且彻底破坏了通往边区的大小道路。他们对棉花、布匹、药品、火柴以及边区需要的所有日用品，一律严禁输入；对边区输出的食盐和其他土产也实行严格检查。边区军队和党政机关是他们严密封锁的对象，对于一般商人、脚户，他们也不放过，发现有所谓“走私”的，常被他们就地枪杀。

对于那时的困难，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张。大的方面不说，仅举我自己的一件小事为例：我刮胡须使用的几片刀片，是我一九三〇年以前在苏联学习时买的。回国后已用了八、九年了，每次刮脸前，我都要在石头上磨一磨。刀片又薄又小，磨起来挺费劲。后来我到陇东时，钳工出身的耿飏，用铁皮给我做了一个夹子，把刀片固定住，磨起来就好多了。但由于用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怎么磨也还是不锋利，刮起胡须来，还是疼痛难忍。其实，小小刀片，在西安等大城市都能买到，但由于顽军封锁，许多急需物资都进不来，这类小商品就更谈不上了。

用什么办法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克服这重重困难呢？向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伸手吗？陕北地瘠民穷。群众吃不饱、穿不暖，他们宁可自己吃野菜、树叶，仍然缴纳了不少公粮，尽了最大的努力。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生活同样非常艰苦，日子过得很困难。尤其是一九四〇年，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先后袭来，边区生产遭到严重损失，六十万灾民嗷嗷待哺。记得这年初春，边区各县就普遍遭受旱灾；延安等县，又发生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等瘟疫，仅盘龙一区就死了五百多人。六、七月间，各地又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水势之大，为近百年来所未有，沿河庄稼、农田全被冲毁。在这前后，保安等地还遭受雹灾，落在地上的冰雹一尺多厚。盐池、靖边等地，飓风蔽日，数月未停，毁坏了许多庄稼以及房屋、牲畜。林伯渠同志和我当时曾联名致电重庆赈济委员会，请求拨款救灾。这个赈委会竟然不加理睬。事后想想也不奇怪。国民党的既定政策是把边区几百万军民困死，哪里还会帮助你救灾呢！

正当我们在为战胜困难寻求对策的时候，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

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力，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象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也可以想些办法，来它个反封锁嘛！在谈到军队的任务时，他又笑着对我说：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么？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紧接着，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向全边区党政军民学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边区军民，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东南而北，都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山峁到山沟，从河滩到原野，到处是开荒种地的人群，到处响起赞美劳动的歌声。那热气腾腾的劳动景象，那战天斗地的生动场面，实在令人感动，催人振奋。

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以农业为主体，或叫“农业第一”。这是因为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至关重要。各部队都紧紧抓住了这个重点，在完成战斗任务的同时，普遍开荒，种粮食、种菜。干部战士生产热情非常高涨。许多同志在黑夜里烧着野火开荒，至于天不亮就上山，顶着星星才收工，就更是很平常的事。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一场暴风骤雨，黄土塌陷，

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农田、栽种起来的庄稼，往往毁于一旦。重新整修和栽培，需要付出成倍的劳动。但由于心中有个大目标，困难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劳动热情。各个部队的生产竞赛都搞得非常红火。他们经常利用一些纪念日，开展竞赛活动，来完成突击任务，如举行“纪念五卅生产大竞赛”、“纪念刘志丹生产周”，等等。部队的劳动热情，一浪高过一浪，而且经久不衰。

一九四〇年冬天，王震同志领导的359旅，奉命开赴南泥湾屯田开荒以后，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指战员们披荆斩棘，艰苦奋斗。有的部队没有房屋住，没有粮食吃，他们就露宿荒山，吃野菜、草根充饥，连续苦干了几个月，硬是用自己的双手，把一个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大生产运动一开始，359旅就提出“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分钱”。几年以后，他们的粮食生产，竟达到了“耕二余一”，即积余一年的粮食，还达到了平均两人一头猪，一人两只羊，鸡鸭成群，牛羊满山。

在鄜县一带，警四团奉命除留少数警戒部队外，开了一个叫槐树庄的地方开荒生产。部队在露宿石崖边、饭菜见风凉的艰苦条件下，打窑洞建营房，经过两个多月奋战，解决了住房问题后，立即动手，开荒生产，并大搞多种经营，积极发展养殖业、畜牧业、作坊、手工业等。两年就开荒两万三千余亩，收获粮食六、七十万斤。副业生产也搞得很有成效。

驻防陇东，由王维舟、甘渭汉、耿飆同志领导的385旅，在大生产运动中也搞得热火朝天。庆阳、合水一带有水，他们就开荒种水稻，生产出陕北稀有的稻米。大风川、小凤川一带，草深林密，他们把部队开进去，烧荒造地。树林里常有虎豹豺狼，他们就组织战士三人一组，把打猎同练习打靶结合起来，锻炼了射击本领，还猎获了不少野味。战士们打豹子的办法很有意思：把一颗手榴弹同一只野兔子栓在一起，挂在树枝上，豹子一口咬去，手榴弹爆炸，一只豹子便被猎获了。有一回，他们挑选了一只大豹子，运到延安，送给了米德总司令。

在大抓农业生产的同时，我们也抓紧了工业生产。为解决部队的被服供应，首先抓了纺织工业，先后开办了纺织厂十一处。其中以团结部直接筹办的大光纺织厂发展最迅速。开始只有一个战士会织布。在领导的支持下，他买了一架水机、一捆棉纱，作为试验，一天就织了十几丈布，计算起来，成本较市价便宜三分之一。于是，他们便抽调了二十几个战士，买了十多架织机，办起了纺织厂，不到半年工夫就部分地解决了部队的需要。到一九四三年，这个厂就已发展到拥有织机一百多架、职工二百多人、蛮象个样子的工厂了。

除纺织厂以外，还开办了被服厂、鞋袜厂、木工厂、大车厂、煤炭窑、木炭窑、砖瓦窑、磁器窑、毡房、粉房、他房、豆腐坊……等等，共计五十二处。此外，畜牧业、

运输业、商业，也都相应有了发展。

大生产运动开展那样普遍，那样热烈，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带头参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亲自动手种菜纺纱，参加助民劳动。在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在他住的窑洞对面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条形的耕地，种上了蔬菜，一有空，他就去浇水、拔草。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都有一架手摇纺车，经常象女同志那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纱。有一次纺纱比赛，我和周恩朱同志一起参加了。他看到我纺的纱质量还可以，就夸奖说：真看不出你这粗手大脚的人，还能纺出这般好的纱来！我笑着说：我这是祖传的手艺。他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父亲就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嘛！恩来同志哈哈大笑说：怪不得你会纺纱呢！其实，我不过是说说笑话。我祖父和父亲的确都是农村的手工业者，一年到头带着纺纱织布工具，走村串户，去替人家纺纱、织布。但我真正练习纺纱，也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才开始的。起初纺出的纱不是太粗就是太细，后来纺得多了，才比较均匀。倒是恩来同志、弼时同志进步更快。在延安的纺纱比赛大会上，他俩双双获奖。听说，他俩当年用过的纺车，至今还陈列在各自住过的窑洞里呢！透过这类小事，可以看出那时候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和平易近人，看出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融洽关系。回想起来，是多么令人难忘啊！

· 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换来了丰硕的劳动成果。国民

党顽固派做梦也没有想到，边区军民凭着自己的一双手，不但摆脱了困境，而且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奇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和爱国华侨陈嘉庚等到延安时，看到边区欣欣向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景象，无不赞叹万分。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将军有次路过延安，正逢边区军民举办生产成果展览会。展品中有各地生产的稻、麦、小米、玉蜀黍等一、二十种粮食产品，有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有花样不少的布匹、鞋袜、文具和其他日用品，有膘肥体壮的马、牛、羊和鸡、鹅等家禽家畜，还有驻陇东一带战士猎获的各种野兽毛皮，有驻三边战士挖掘的长达二十多米的“甘草王”。真是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当我陪他去参观时，他边看边啧啧称赞。走到一堆大得出奇的南瓜旁边时，他兴奋极了，用手摸着南瓜，又感慨又风趣地说：还是毛主席领导得好啊！边区种出来的南瓜也比别的地方大嘛！

同边区各条战线一样，留守兵团的生产成绩也是一年比一年显著。到一九四三年就完全克服了当时遇到的严重经济困难，大大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达一年，留守兵团开荒近二十万亩，收细粮四百六十五万公斤，蔬菜一千六百五十万公斤，织布一万三千余匹，养猪一万余头，商业获利七亿三千余万元。达年十一月底，毛泽东同志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讲话时，曾很兴奋地谈到：“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掘衣、毛衣、鞋袜，

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不仅如此，通过生产劳动，还造就出一大批不怕艰难困苦、能劳动、会理财的先进人物。留守兵团所属部队被评选为全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就有赵占魁、赵占奎、武生华、胡青山、张治国、冯国玉等六位同志。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边区军民还运用各种方式，向顽固派展开了反掠夺破坏，反物资封锁的尖锐斗争。留守兵团的指战员们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

国民党在我部县黄龙山一带，曾占用了一片土地，名为“黄龙山垦区”，作为沦陷区逃陕难民的栖身之地。这本来不是件坏事。但国民党派驻这个垦区的头目，却打着安置难民的旗号，把附近大片民间熟田，随意划进垦区范围；并擅自设立警察局、所，非法盘查来往商民，掠夺村民牲口、财物。随后，又把当地的游民、流氓、土匪，多达一百多户，统统搜罗起来，冒称是垦区管辖的难民。这些游民、歹徒，一经报名加入垦区，便连同他们所租种的边区土地，一律成为垦区“公有”，免纳一切捐税。对于这种强夺农田、抢劫财物、破坏边区生产建设的行为，我留守兵团驻当地的警备部队，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在当地政府的密切配合下，坚决撤消了垦区私设的警察局、所，拘捕了一批抢劫财物的匪徒，收回了部分农田，打击了垦区头目

的嚣张气焰。后来，垦区头目向国民党当局告状，通过重庆的赈济委员会，致电毛泽东主席，指责我方以武力压迫垦区“灾民”。毛主席把这份电报批转给我。我在致重庆赈委会的复电中，历数了这个垦区头目的种种倒行逆施，坚决驳斥了对方的指责。

定边西北的苟池盐区，早在一九三五年红军占领该地时，为尊重蒙古族人民利益，就已主动交给蒙古人管理。蒙古人非常感激，允许我军无价采盐，历时数年，一直没闹任何意见。我军从这个盐区采的食盐，不但要保证供应边区军民食用，而且是边区的一宗最重要的出口物资。一九三九年以后，反共顽固派为了切断边区的经济来源，驻当地的国民党官吏竟然鼓动少数蒙古人，阻止我军采盐；并且散布谣言，胡说共产党、八路军“主张蒙人独立建国”、“要打倒王公”，企图制造民族纠纷，破坏蒙汉团结。得知这一情况以后，我留守兵团一面增派了一部分部队驻防该地，以保护盐区；一面派人向蒙古族官吏和人民耐心解释，宣传我党我军主张，揭露顽固派的造谣、挑拨。国民党天水行营政治部一个姓谷的部长，竟来电指责我方。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在给程潜和这位谷部长的复电中，陈述了事实真相，并且严正指出，责难我方的种种传言，“全系奸人造谣捏根，绝无一字属实”，并要求对方“彻查严究”。经过这一番工作和斗争，顽固派的阴谋破产了，蒙古族人民消除了疑虑，与我军和睦相处，一如既往。边区境内的

这一重要经济区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景象，盐业生产继续蓬勃发展。

为了打破顽固派对边区进出口物资的封锁，边区政府在中央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在陇东、关中、绥德等地设立了不少土产公司、盐业公司等商业机构，广泛发动当地群众，开展对外贸易。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也普遍派出干部，参加到这些公司里去做生意。有的还在地方政府领导下，自己开设公司。兵团领导机关，就抽调了两名科长，派到关中土产公司和盐业公司去工作了许多年。这两人一个是队列科长隐剑，一个是交际科长刘琦。他们离开延安时，我同他们谈话，向他们交代说：“你们去做生意，不是为个人捞钱，而是为了补充军需民用物资，增加财政收入，繁荣边区经济，打破顽固派的封锁，这不是一般的经商，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斗争。很辛苦，还要冒风险。你们到那里后，一是要依靠地方政府，二是依靠当地群众。掌握了这两条，就能把工作做好。”这两个同志到职后，与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很快打开了贸易局面。

边区可以用来输出的物资，主要是食盐和一些土产，需要输入的主要是棉花、布匹、药品和当时自己还不能制造的日用品。运输工具只有陕北的毛驴和骡子。一支运输队往往有几十甚至几百匹毛驴。人们把这种贸易戏称为“驴狗子经济”。封锁线上，碉堡密布，岗哨林立。一批物资要运出去或运进来，都很不容易。但是，顽军封锁得再厉害，

当地群众总还是有办法对付的。许多人在边区境外，甚至在顽军内部都有亲戚、朋友。他们常常通过各种内线关系，运送各种物资。有不少商人同情抗日，对边区有好感，愿意帮助我们。有些商人即使没有这种觉悟，但他们想赚钱，也愿意同边区做买卖。另外，封锁线上的岗哨再多，但各个岗哨之间总有一些空档，当地群众对地形又熟。这样，运输队就可以在黑夜，赶着驮货的毛驴，从这些空档中，快速通过封锁线。有时，我们也掏点钱，通过关系塞给哨卡头目和哨兵，让他们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同我方事先约好通过封锁线的时间。边区的食盐、土产，运出封锁线以外，远销到河南、湖北等地；运进的货物，由各个系统的同志迅速运回本单位。当时留守兵团的直属机关、部队，就通过关中的这条渠道，补充了不少急需的生活用品。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边区可以用于出口的物资，不断增多，买卖越做越大。尽管许多生活用品，边区可以自己生产了，但群众生活在不断提高，需要进口的物资仍然不断增多。隐剑同志担任经理的盐业公司，几年后竟发展到拥有几十座仓库，一次就能出口几十万斤食盐，换回大批需要的货物。当然，干这项工作的同志非常紧张劳累，还要担风险。道路崎岖不平，有的地段还有虎豹豺狼，遇上塌方或泥石流，道路堵塞，运送货物就更为困难。运输队驮运的物资，有时被顽军盘查扣留，有的干部和群众，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但为了打破顽固派的经济封

锁，大家始终不辞劳累，不避艰险，前仆后继，战斗在自己的光荣岗位上。反共顽固派机关算尽，妄图困死、饿死我们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了。

学 习 和 整 风

延安的学习空气之浓是空前的。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无论是一般干部还是党的高级干部，都是如饥似渴、孜孜以求，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军事理论，学习文化知识。后来人们称延安是革命的熔炉，革命的摇篮，革命的圣地，都不言过其实。正是在延安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这种空前的学习运动中，一大批朴素的战士受到了革命理论的熏陶，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成长为自觉的战士，成长为革命战争的栋梁之材。延安的学习不仅使我终生难忘，而且使我受益终生。因而我想就自己的亲身感受，再谈一谈延安的学习。

使我首先难以忘怀的是毛泽东同志。他是延安学习的倡导者，也是延安时期学习的表率。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到延安就任军委参谋长，我们的总参谋都与毛泽东、朱德同志等都住在延安城北凤凰山麓一个吴家地主的院子里。我们与毛泽东同志只有一墙之隔，亲眼目睹了他研究革命理论的情景。那时候的延安，是全国的抗日中心，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日理万机，掌握全国的形势，指挥着千军万

马，工作十分繁忙。为了正确指导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毛泽东同志分秒必争地学习，进行了艰苦的理论研究。在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堆放着书，就是寝室的布置也别具一格——床头上总是放置着一个大型书架。他窑洞里的灯光，经常是通宵达旦地亮着。我每每去请示汇报工作，十有八、九是碰见他在看书或是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些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理论著作，就产生于延安这平凡的窑洞中，产生于昏黄的美孚油灯下。毛泽东同志非常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特别喜欢找各方面的专家来交谈。他研究哲学问题的时候，就经常找艾思奇同志来，一起探讨有关问题，请艾思奇做自己的哲学顾问。有从前方回来的同志，毛主席特别注意与他们交谈，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或熟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运用自如，因而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有高屋建瓴之气势。他是那样的博学多闻，又是那样的永不满足。只要是他没有看过的书，他都要找来看。记得有一次，贺子珍同志到我家玩，看到我保存了几本军事书籍，就回去告诉了毛主席。一天，毛主席踱着方步来到了我的窑洞，对我说，听说你这儿藏了“宝贝”，给我看看怎么样？我一时愕然，不知主席指的是什么？当他说出是我的《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军事书时，我当时还真有些舍不得给地。这两本书是我在中央苏区时收集的。长征那样艰

苦，过封锁线、爬雪山、过草地，几次轻装都没舍得丢掉，一直背到延安。在建立留守兵团期间，延安的军事书籍极缺，这两本书更成了我的“家珍”。毛主席看着我那十分不情愿的样子，又说，他借去看看，看完后一定还给我。这两本书就这样“借”给了毛主席，以后毛主席也没有“还”我。现在想起来，还为自己当年的“小气”感到好笑。那也是延安的艰苦条件造成的，那时要想在边区搞到这些书，真可谓“难于上青天”啊。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在酝酿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著名的军事著作时，曾把我和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同志找去，和我们交谈这一军事现论问题。他提出为什么要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的位置，怎样指导游击战争，以及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中的外线作战等等问题，要我们各抒己见，象老师考学生似的，一个人一个人的回答问题。我记得当时毛主席主要问我游击战争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指挥要领。我回答说，就是要在军事上想方设法使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因而要坚决地采取主动的进攻方略，要善于集中兵力，灵活地、有计划地运用兵力。毛主席对我的“集中兵力”的观点有些异义，他认为我的这个“集中兵力”的观点讲的不够明确。在当前敌强我弱的抗日战争中，在战略上，我们强调以分散的游击战争为主，而不是集中兵力的大兵团作战。集中兵力的提法，只用在战役战斗上，相对集中数倍于敌

人的兵力，达到歼灭战的目的。对我的其他几个观点，则很感兴趣，表示赞同。谈完以后，毛主席给我们每人出了个题目，要我们每人回去写一篇文章给他。对我则嘱之将谈的几个观点写出来。我回去以后，进一步学习了军事理论，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思索，还与参谋处的几位同志进行了研究，写了一个《游击战争指导要领》的提纲。在“指导的基本原则”部分里，我写了当着敌人向游击区域或有抗日政权的区域进攻时，采取被动的单纯防御，分兵把口，以至被敌人各个击破，这些部是游击战争指挥者的戒条。而要采取积极进攻的方略，集中主力消灭与削弱敌人，或行动于敌人战略要害上给敌以致命的打击，以这样进攻的方略来争取主动的地位。我还写了兵力的灵活运用，是转变敌我形势，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手段。好象渔人打鱼一样，既要散的开，又要收得拢。另外还写了要有计划性的问题。这篇文章送给毛主席以后，他认为还不错，让我在抗大、鲁艺讲这堂课。后来，这三个观点被毛主席部分地采用了。这一年，在延安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主席又做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这两篇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系统地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和为什么要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理论上进一步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根据这一理论，毛主席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必须经过三个

阶段，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也就是敌人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我们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的转变，最后敌败我胜。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当时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我们都很敬佩毛主席这一科学的理论分析。大家从实践的基础上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的高度，真有顿开茅塞之感。这一理论，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武装了全党的头脑，从而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一九三八年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王明教条主义对全党的思想影响，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同志向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号召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看谁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一九三九年三月，中央宣传部制订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延安四千多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地坚持每日两小时的读书制度。我是在张闻天同志领导的学习小组里。小组里还有毛主席、朱德、李维汉、徐特立、莫文骅、柯柏年等同志。我们这个组专门学哲学，由艾思奇担任指导。艾思奇在当时已是边区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了，他上的哲学课通俗易懂，很受欢迎。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学习方式是由艾思奇写提纲，指定参考书，平日自学，星期六上午开一次讨论会。讨论总是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畅说，最后由艾思奇做总结。

那时我学哲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学习收获也很大，并与艾思奇建立了友谊。直到解放后，每每遇到艾思奇，我也还向他请教一些哲学问题。那时，我们的这个学习小组还是延安的模范学习小组。有一次，我们小组学习完后，毛主席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一毛不拔，今天我要拔一根毛，请你们大家吃一顿饭，谁让我姓毛呢！于是我们大家便在毛主席家会了一顿饭，开心得很。哲学学习从理论上提高了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在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中国的革命战争、探索战争的指导规律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坚持南满斗争、入关以后的渡江、衡宝等战役中，之所以打胜仗，正是成功地运用了军事辩证法。这个功劳，也应当记在延安的学习上。

延安的学习最突出的一条，就是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学风，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就当时党的状况来说，党已经成长为拥有几十万党员、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但是，由于十年内战时期“左”的错误还未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清算，由于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加入到党的队伍里，党内还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而主观主义又以教条主义为当时的主要危害。一九四二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延安开始了以“反对主观

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学习运动。中央指定了二十二个学习文件，编印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件。学习这些文件，回顾党所走过的道路，总结历史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义认识更加深刻了，对王明为代表“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认识更清楚了。同时，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学习，端正党风、学风、作风，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实际、很深刻的教育。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用整风的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和检查陕甘宁边区工作的会议。会议的前一阶段主要总结了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前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肃清“左”的错误的影响。接着，毛主席在会上做了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宣讲报告，一方面概括了边区党的历史教训，指出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必要；另一方面指出要联系当前边区工作的实际，特别要就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进行整风。在会议的后一阶段，提出“整党、整民、整政、整军、整关（系）”“五整”结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团以上干部有七十多人在会上发言，各自检讨自己工作中存在的“三风”。无须讳言，

在这次会上我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也受到了批评。留守兵团五年来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高干会上批评了留守兵团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干部输送方面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实事求是的说，留守兵团从那样一个比较散乱的状况，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白手起家，在毛泽东同志、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确是不容易的。作为我这个直接领导者来说，对这个部队的每一个官兵更是倍加珍爱。那时，前方部队需要干部，就到后方来要，留守兵团陆续向前方输送了一批干部。自己手下好的干部、战士送出去，做为指挥员，好象嫁姑娘一样，是有些舍不得的感情。同时从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任务来说，没有一定数量的部队也不行。我记得项英向我们要干部，并点名把杨立三和一位姓范的副官处长要走了，我向毛主席报告这件事的时候，毛主席说，前方需要干部，后方也需要干部，这个关系要处理好。留守兵团的干部调动频繁，情绪就不容易安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当时在部队中，从上到下要求上前线的呼声非常强烈，这种积极送取，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很可贵的，但留守后方保卫革命大本营的任务又不允许大家都上前线。对此我们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如果上前线的口子开大了，部队的思想就更加波动。直至解放以后，当时留守兵团的一些旅团干部见了我还一个劲地埋怨我当初不让他们去前线。对此，我只好向他们表示歉意了。总之，从考虑留守兵团

所担负的任务出发，我当时的确对有些来要干部的同志没有完全满足要求，基本事实和想法就是这样。

再一个问题是军政、军民关系问题。在军政关系上，留守兵团有不尊重地方政府的现象，对西北局的领导，没有经常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部队中也存在一些不尊重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闹纠纷的事情。下面有些部队政策观念不强，在生产上有的与民争利，有的做违反政府法令的事，影响了军民关系。高干会议上批评留守兵团不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有闹独立性、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违反群众纪律等缺点错误，这些批评是中肯的，我做为留守兵团的主要负责人，对这些问题要负主要责任。那时候那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风气也是很令人怀念的。在会议后期，对留守兵团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扩大化了，上纲过高，例如说是路线错误，是军阀主义，甚至与张国焘的“军党论”相提并论，对留守兵团的干部打击面过宽，挫伤了一部分同志的积极性，这一历史问题，也应当实事求是的加以说明。

在处理军政、军民团结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对我进行过多次教育，使我难以忘怀。当时的军政关系，主要是留守兵团与西北局的关系，而高岗是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这个问题说起来是有历史渊源的。刚到陕北时，陕北红军中“左”的路线正在打击刘志丹同志，也包括高岗。毛主席了解到这个情况，及时地将他们解救出来。刘志丹是陕

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个以革命利益为重、很正派的好同志。中央红军到陕北后，他没有一点自恃陕北根据地主人向党讨价还价的思想，而是兢兢业业的工作，维护党中央的领导。不幸，在红军东征山西的作战中，刘志丹英勇牺牲了。志丹同志牺牲后，高岗成为陕北红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对陕北的干部是非常尊重的，他特别注重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认为这是保证中央路线顺利贯彻执行的重要条件。而我对这一点则认识不足。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对高岗的印象并不佳，感到这个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在我当军委参谋长的时候，高岗从三边剿匪回来，中央决定让他暂留在军委一局代理局长，高岗得知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安排太低。后来，他当了边区保安司令部的司令。成立留守兵团时，保安司令部隶属于留守兵团。因而，在一个时期里，我把对高岗的关系仅处理成一般的隶属关系。有一次飞机场正在修理，有飞机要降落，我让高岗去督促快些把机场修好，结果任务没完成，我还对他发了火。以后，高岗成了西北局的领导。我当时认为，留守兵团属于中央军委直接的领导。与西北局没有直接隶属关系，所以也没有经常向西北局报告工作。对此，毛泽东同志多次教育我，批评我，要我尊重高岗，尊重地方政府，搞好军政关系。毛主席说，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讨。军队和地方闹了矛盾，军队首先做了自我批评，事情就比较好办。

了。这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毛主席还推心置腹地对我说，要尊重西北局的领导，连我们中央决定的事都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也就应当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他的领导艺术是很高超的，这点对我教育特别深刻。记得毛主席曾经和我谈，要我经常出去走一走，到军队、地方政府以及军队和地方领导同志中间走一走，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而这正好是我的弱点，我就是不善于做这种联络工作。所以有一次，毛主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肖劲光，你是个大知识分子”。开始，我听到这话时吃了一惊，心想，我怎么算个大知识分子呢？后来仔细回味毛主席的话，理解这可能是一语双关，一方面在那个时候象我这样的高中生，又出国吃过几年洋面包，在革命队伍中可以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另一方面可能是对我工作作风的批评，说我这个人善于疏通关系，办事死板，常被人认为是自恃清高，有些“大知识分子”的味道吧。

西北局高干会尽管对留守兵面的批评存在一些问题，但它的成绩是主要的，它是延安整风中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使我们每一个参加会议的干部都受到了教育，也确实解决了留守兵团存在的一些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对留守兵团的建设起了促进作用。一九四三年春节，留守兵团首创拥政爱民活动，地方政府也开展热烈的拥军活动，这一

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革命的传统。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总结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经验，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这一重要历史文件。这个文件是兵团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在一九四四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动手写成的。在这个报告里充分肯定了留守兵团政治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指出，通过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留守兵团“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和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进步，可以为一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所效仿”。报告特别指明，“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几十年来，这个文件在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方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整风运动从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始，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还进行了党的历史大讨论，对建党以来党的历史，对党的历史上各次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特别是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当时分别各个根据地，开了一些座谈会，我就曾经参加了闽西历史座谈会。通过这样的历史大讨论，分清了路线是非，深刻分析了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提高了全党马列主义的水平。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接着，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

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总结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军事斗争的经验，提出游击战争到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和迎接抗日反攻的任务。同时，总结了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通过了新党章，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七大”实现了全党在正确路线基础上的空前的团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做了准备。在这次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四五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在枣园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毛主席诚恳地对我说，高干会批评了留守兵团，但是留守兵团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留守兵团有缺点错误，但性质是属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不是路线错误。高干会对留守兵团所做的不治当的结论应予纠正。高干会前后调动了许多留守兵团干部的工作，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在方法上是不对的。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心悦诚服，所谓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就是说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但对于这些缺点错误必须正视，勇于改正，那才是正确的态度。第五条说：

“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如果党不害怕抗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

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既肯定了成绩，又分清了错误是非，并教育我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他教育干部的良苦用心，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深刻地体会它。几十年来，毛主席的这一谆谆教导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延安十年之所以使我念念不忘的，正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亲切教诲和毛泽东思想对我的教育。在这里，我受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军事辩证法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深刻启迪；学习和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以及军事战略战术的光辉思想；领略和体验了毛主席政策和策略的伟大思想……这对我以后的军事生涯以及建国以后海军建设中，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第一代人。今天，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深深感到，在那样一个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洞察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率先提出并在全党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了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进行艰苦的理论创造和理论教育，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抗日战争的发展不可能那么顺利。因而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